

中美核领域对话的回顾与展望

滕建群

【关键词】中美核领域对话、核战略、核威慑

【提要】1月12日，美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到访中国第二炮兵司令部。二炮领导会见盖茨一行并介绍中国核政策和核战略。盖茨邀二炮领导尽早访美。尽管没有6年前拉姆斯菲尔德首访二炮那样轰动，但此行仍受到美方高度重视。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把与我二炮的对话看成是两军交流的重要内容，认为是中国军事透明的具体表现，盖茨本人就是核领域对话的积极推动者。中美核领域对话^[1]主要是指双方官员和学者围绕着核政策、核战略、核武器现代化等诸方面进行的交流活动。它从非政府层面延伸到政府层面，历时数载，但到目前为止结果不多。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双方核力量水平相差甚远、双方核战略内涵与处延均有不同所指、两国理论界对核领域对话定义不同以及核对话动机与期盼也不一样，这些因素都直接影响到核领域对话。

【中图分类号】D822.3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11)3 期 0025—05

【完稿日期】2010年12月5日

【作者简介】滕建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中美核领域对话层次多，对增进双边在核领域里的相互理解与互信、稳定两国战略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国际安全形势演变，这种对话被注入新内涵：在大幅度削减核武器数量并同俄罗斯达成新战略武器条约后，美国开始担忧中国核武器现代化走向，急于与中国进行核领域对话，提出诸如核透明等要求，建议两国进行冷战期间美苏式核裁军谈判等。中国则认为，其核发展政策、核裁军政策、核战略、核力量构成并没发生根本性变化，不可能在核透明等领域走得更远。

一、两国核领域对话的演变

中美核领域对话分官方和非官方两种。非官方

又可分为纯学术性二轨对话和由非政府组织牵头、官员参加的一轨半（1.5轨）对话。近年来的对话实践表明，美方更愿意走上到下的“上层路线”，即希望把核领域对话扩展到官方层面，特别是扩展到高层次战略对话中；但中方则对此持慎重态度，认为两国核对话千头万绪，应从低到高和从技术到政策谈起，这样做会更有成效。这种路线上的分歧既有国情不同的原因，也与对对话目标企盼不同有关。

两国非官方核领域对话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国内相关大学和研究机构开始与美国同行接触，就核武器的作用、核战略、中美核关系等进行探讨。到20世纪90年代初，这种对话逐渐活跃起来。国内大学和研究机构不但举办核领域问题研讨

[1] 由于核能具有军民两用性特点，本文所提及的核领域主要是指核能的军事应用，多年来中美两国核领域里的对话主要也是指核能的军事应用，主要包括政策和技术两个层面的问题。

会,有关专家出版专著和发表论文,还举行了核军控与核裁军讲习班。参加人员既有学者,也有政府官员。时至今日,这种非政府组织牵头的核领域对话已形成固定机制的并不多。

中美官方核领域对话稍晚也被列入交流日程。2005年10月19日,时任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参观解放军第二炮兵司令部和指挥所,成为这支部队成立39年来接待的第一位外宾,是当时较轰动的新闻,随行美国官员把这次访问称为“历史性的”,因为美国人看到了他们一直想看的东西。第二炮兵司令靖志远将军告诉拉姆斯菲尔德,所谓中国战略导弹瞄准某些国家的报道毫无根据,他还向拉姆斯菲尔德重申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拉姆斯菲尔德这次参观访问尽管更具有象征意义,但却表明中国政府愿意与美国政府就核领域里的相关问题进行交流。

2006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布什总统主动提出,要与中国进行核领域对话,双方领导人同意启动两国就核问题的官方交流。美战略司令部司令詹姆斯·E.卡特怀特邀中国二炮司令靖志远上将做客美国核战总部。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主席卡罗琳·巴索洛米女士说:“委员会提议中美展开战略层级的部队对话,从而确保中美双方能够了解对方的底线。”

2008年4月,中美首次官方核领域对话在华盛顿举行,两国军方派出代表参会,此次会议并无突破性成果。总体看,美方急于拉中国开展核领域的对话,希望更进一步了解中国在核领域的详细情况。双方关注的议题至少有三:核威慑、核透明和核裁军。

二、中美核领域对话的三个议题

(一)核威慑。中美是否存在核威慑一直是学界争议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双方都握有核武器,长时间互为对手,相互威慑是存在的事实。但另有学者认为,建国后中国并没有核武器,美国也不敢用核武器打击中国,并不是核武器威慑住美国动核的手脚;如今中美核力量相差悬殊,中国核力量即

使其威慑能力,也是有限的。双方的分歧还表现在各自官方表述上。

中国把核能力看作是避战和维系和平的艺术和手段,认为威慑在确保国家安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避免核战争方面。中国宣布,核战略从属并服务于国家核政策和军事战略,目标是保证国家不受其他国家对中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中国起初不喜欢“威慑”一词,因为它一直与帝国主义的讹诈与侵略相关。1995年发表的军控与防扩散白皮书指出,“中国政府历来反对核讹诈和核威慑政策。”1996年,中国在联大第51届大会上提出五点核裁军主张,其中一点就是“核大国放弃核威慑政策”。

到1990年代后期,中国关于核威慑的态度发生明显变化。2002年发表的《中国的国防》白皮书指出,“中国保持精干有效的核反击力量,是为了遏制他国对中国可能的核攻击,任何此种行为都将导致中国的报复性核反击。中国核武器的数量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其规模、结构组成和发展与中国的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相一致”。此后发表的白皮书中又强调,“中国保持有限的核反击力量,是为了遏制他国对中国可能的核攻击”。第二炮兵“主要担负遏制他国对中国使用核武器、遂行核反击和常规导弹精确打击任务。”

和中国比,美国的核威慑定义鲜明而多变。1991年冷战结束前夕,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写道:“威慑任何能威胁到美国及其盟国安全的入侵行为,一旦失败,击退或打败军事进攻,并以有利于美国及其盟国的条件结束冲突。”在美国人眼里,以核武器威慑苏联是美国保证其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其实,冷战期间真正谈得上相互威慑的国家只有美苏。2002年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写道:“传统意义的核威慑无法用于对付那些公开宣称战术不加节制的恐怖分子。”2006年的《国家安全战略》认为:“安全可靠的核力量将继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正发展新‘三位一体’力量来强化威慑能力,它们由进攻性打击系统(核常兼备能力)、积极和消极防御系统(包括导弹防御系统)和具有反应能力的基础设施组成。”

美国把“威慑”扩展到常规领域，特点是核常兼备、攻防一体和多能。美国准备在任何地方打击敌手。

奥巴马要打造无核武器世界，但美国并没放弃核威慑。2010年1月，基辛格等四位元老发文，告诉人们“如何保持美国的核威慑”，美国必须“走上两条并行道，一条是通过保持美国的威慑来减少核危险，另一条是通过军控和国际合作来防止扩散”。2010年5月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美国将重新强调威慑，它不单单包括军事手段，还包括外交行动。新战略报告强调对地区威慑的重要性，指出“美国将强化地区威慑态势，如通过分阶段和灵活变化的导弹防御计划等，目的就是要让地区性敌手明白通过获取新的进攻性军事能力得不到任何便宜”。

不可否认，中美对核威慑的认识和应用有相似之处：都认为核威慑是避战手段，而不是目的。然而，两国也有本质不同：（1）美国要威慑的目标是所有被认为与美国敌对的国家，中国仅是潜在的有核武器国家。（2）美国核威慑分多层次，包括战略威慑、地区威慑（延伸威慑），除保护本土外，还有保护其盟国和朋友的义务，而中国核威慑只是保家卫国。（3）中国核威慑的目标是免遭核武器打击，美国则在遭受生化武器袭击后即可动用核武器。（4）美国核威慑贴上防御标签，但不论从其部署态势还是作战理念上看，其核武器都具有先发制人的能力，中国核力量一直保持低警戒状态，不瞄准任何国家，只用于第二次核反击。正因为核威慑认识和应用上有诸多不同，两国学者和官员在各层次核领域对话中围绕着核威慑的争论时有发生。

（二）核透明。两国核领域对话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就是核透明。美国认为，透明是国际关系稳定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美国在军事事务上追求高度的透明，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盟国，都要保持军事现代化的透明。在美国看来，增加核透明是消除信息缺乏，消除误解的重要手段。通过制订高透明度的核政策，中美可减少信息误判，更好地保卫自身的安全利益。美国还认为，透明是建国

家信任的基础，没有透明度而依靠有限的信任是不能实现合作的。因此，美国一直在强调军事能力、数量、预算、现代化计划等方面的透明，认为虽然意图透明可减少他国的忧虑，但能力的透明更为重要，因为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一个国家可能采取的政策和行动。

与美国不同，中国一直坚持意图的透明是极其重要的，认为如果两国没有利益冲突，即使是对方强大，自己也不会受到威胁。反之，如果两国的安全利益相矛盾，或者强大一方有进攻意图，那么弱小一方肯定会受到威胁，所以它必须保持自己能力的模糊性，并准备应付冲突。中国许多学者坚持认为，因为美国是强大的国家，所以它开放和高度透明，这样做并不会伤害其自身的利益。如果核弹头数量和美国一样多，那中国也会在弹头数量上透明。从另一角度看，美国有意展示自己的实力，以此来阻止他国直接与美国发生竞争和冲突。透明是达成威慑的手段，能增进其安全利益。而对仅保持最低核威慑能力的中国来说，把数量和部署情况透明无疑是把看家本领告诉对手。中国做不到，其他中等核国家也做不到。

美国2010年版《核态势审议》报告把中俄相提并论，“透明”一词反复出现17次，多与中国有关。“在面对越来越严峻的核恐怖和核扩散同时，美国必须同样重视与有核武器国家战略稳定方面的挑战，特别是俄罗斯和中国。”美国要采取“更广泛措施以扩大合作和透明，增强对俄中的战略稳定。未来，美国任何核裁军必以继续强化对地区性敌手的威慑能力、增强与俄中战略稳定和确保对美国盟友和伙伴的安全为前提”。报告特别强调，增加与俄中透明与互信，美国可为建立无核武器世界创造条件，为建立防核扩散和打击核恐怖奠定坚实基础。进行中美核战略对话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场所和机制，以进行战略、政策、核武器计划及其他战略能力的交流，目的就是“增加信任，提高透明和减少误判”。

表面看，似乎中国军事现代化出了问题，特别是核武器库不透明。然而在要求中国透明的背后是美国强烈的担心。同样是有核国家，同样对核武器

库保持模糊和保密状态，美国为什么不点英法两国的名，而大张旗鼓强调中国？中国这次被排在俄罗斯后面显示出美方的不安：中国核力量走向何方？特别是在美俄承诺大幅度核裁军后，中国如果不裁反增，岂不打破美俄占主导地位的核平衡，威胁到美国的绝对优势？所以，一再要求中国核力量、核战略、核政策透明，反映出美国从上到下对中国国防现代化的不放心。

中国核力量有限，远不及美俄各拥核武器的零头，即使两国再裁一半核武器，中国有限核武器也不会影响到所谓“战略稳定”和优势地位。而落实美俄刚达成的新裁军目标，至少需要10年。2009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安理会核裁军和防扩散峰会上已表态，其他有核武国家会在适当时候加入国际核裁军。由于不在一个重量级上，何况美国还拥有常规优势并在建立全球导弹防御体系，双方不会有多少共同语言，已开始的核战略对话也未取得多少成果，个中原因显而易见。

对拥有少量核武的国家来说，保持其政策模糊性完全是为保证其有效可靠，这是惯例。中国核政策和核力量是最经济有效的，这取决于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对核武的认识，也是中国特有的国防政策所决定的，即中国要有核武器，但数量不会太多。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始终把经济建设当成首要任务，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不可能放下这个目标，本末倒置，去扩军备战。中国对核武器现代化的目标是：保证国家免受核攻击。二炮按精干有效原则，集中于核武器信息化水平提高上，确保核武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增强防护、反应、突防和精确打击能力。

（三）核裁军。2010年初，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访问印度时声称：“我当年曾参加了与苏联的削减战略武器的谈判，我无法确定它们是否真削减了战略武器，不过关于核能力的坦率对话，以及双方如何看待彼此的核武器，在冷战中为减少误判和误解起到重要作用。与中国进行类似对话将是富有成果的，也符合全球安全的利益。”核裁军是近期中美核领域对话中另一个热门话题。

无核武器世界倡议的重提和美俄核裁军幅度加大，美国越来越关注中国的核裁军走向，在多种场合反复追问中国何时跟进美俄核裁军。对中国核裁军走向的追问代表着当前美国对中国核政策调整、核力量现代化走向等一系列疑问。

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确立的核裁军政策源于他们对这一涉及国家安全武器的深刻认识，源于他们坚信的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和方法论。现如今国际社会盛传的诸多核裁军思想早在半个世纪前中国就已提出，像美国高谈阔论的“无核武器世界”倡议，奥巴马总统倡导的世界核峰会和核安全保护的主张，与当年中国政府提出的主张并无二致。

中国长期坚持“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的核裁军政策。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对第一代领导人制订的裁军政策产生深刻影响。他们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分析核武器的作用，得出核武器并不万能、也不是致胜终极武器的结论。中国从一开始就把禁止和销毁核武器当成国际社会应承担起的义务，而自身研发核武器的目的也是用核武器消灭核武器，类似观点在马列主义著作中都可找到。只不过中国共产党人把这种观点延伸到核时代，赋予时代特点。

如今，国际安全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美俄大幅度削减核武器数量，中等核武器国家也提出缩小现役核武器规模的计划，英国等国领导人把核裁军当成任内头等工作。在这样大的环境里，中国核裁军政策将会做出重新表述，加入诸如新安全观在内的新思想。但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不会彻底放弃其长期坚持的“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的政策。

中国是否需要夺回这面道义大旗，这是许多关心中国核裁军政策变化的人士近来在问的重要题目。目前讲，中国不会与美国争抢风头，原因在于中国有其自身的战略考虑：第一，中国核裁军政策所有的彻底性、公正性、道义性举世公认，相关提法远远超出奥巴马总统的无核武器世界主张。中国在核裁军道义领域里所站的位置远高于美国。第二，经济力有限。中国不可能把国民经济建设转向

军事领域，其核武器现代化首先是保证现有核武器的安全可靠，同时保证在面对诸如美国导弹防御计划建设等时保证自身的威慑力不受到削弱。第三，韬光养晦政策是中国未来制订核裁军政策的指导原则。在核裁军政策上，中国不会抢着当头，与美国争功，只会静观其变，适时地做出反应。这也正是中国官员和学者对无核武器世界倡议表现冷淡的重要原因，中国更愿意不但要听其言，而且还要观其行。

和改革开放前比，中国的核裁军政策更注重其道义上的含义，高举起核裁军的道义旗帜，不但是中国的宣示性表态，也是建立与有关国家战略稳定的重要部分，特别是与美国战略稳定有助于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美国目前仍把核裁军目光投到俄罗斯身上，但随着美俄核裁军的继续，美国肯定会更多地关注中国的核裁军，两国在道义上都有需要，这也是两国合作的基础。

对美国来说，由于中美核力量不在一个水平上，所以美国目前来看也尚未把中国当成核裁军的主要对手，更关注俄罗斯。对中国来说，美俄是拥有核武器最多的两个国家，占世界总核武器量百分之九十以上。冷战结束后，美俄两个核武器大国对其核武器库进行了近一半的削减，但是其数量仍是中等核武器国家的数倍之多。只有两个核大国削减到一定的程度，中国才会跟进核裁军进程。胡锦涛主席在2009年9月24日联合国安理会防扩散与核裁军峰会上的承诺，重申了中国在这一方面的立场。

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的核裁军政策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变化只是表述形式，不是政策的基本内涵，个中原因不是中国故步自封、不思进取，而是因为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所奠定的核裁军政策至今仍是无法替代的，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三、中美核领域对话走向何方

应指出的是，出现上述诸多分歧与争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双方核力量至少在数量上不是一个等级；双方国家性质决定在使用核武器上的出

发点不同；两国核武器的部署态势也不尽相同，同时在对核武器的认识上也有许多不同，这一切大多是结构性的差异，不可能通过一两次对话就能解决。

(一) 定位。中美两国核领域对话已进行多轮，但并未取得多少实质性成果，证明这个问题的敏感性和复杂性。首先，要确定好对话的战略目标。经多年磨合，已有二轨、一点五轨和一轨核对话机制，对推动两国在该领域的合作、增进相互理解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有较大的改进空间。第二，要做好各类核领域对话的融合与联系。尽管三类核领域对话有不同特点，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但目标一致，即为维护中美战略稳定和增加战略互信服务。目前看，三者互动程度较低，甚至没太多联系。应本着先易后难原则，从较易层面开始对话，争取每次都有收获。第三，三类对话需要规划，应有更高级别统筹，适当时可把核领域对话纳入现已存在的两国经济与战略对话日程中。

(二) 互信。中美彼此怀有疑虑，进行沟通十分必要。如前所述，美国一直在追问中国核透明度，担心中国核武器库现代化将危及美国战略核力量的威慑和实战能力，美国常常推理出“不透明就是威胁”的论断。作为弱势一方，中国始终担心美国一再逼迫中国做核透明是“阴谋”，是要探知中国的核家底，显然不会对美透明。一方面是来自美国的“威胁论”，一方面是来自中国的“阴谋论”，最根本原因是双方互信薄弱。互信必须是双方互动，美国不能只要求中国透明，而在导弹防御、核武器现代化方面对中国保密。

(三) 平等。核领域对话并不单是核物理学家、负责安全事务的官员和学者的工作，它涉及方方面面的人员和领域。两国核能力有较大差异，美国明显在技术和数量上占有优势，这决定了两国在核领域对话时需要摆正双方位置。美国应放下身段，与中国在一个平面上交流看法和信息，而不是指手划脚甚至采取施压方式让中国做选择。这不符合对话的原意，也不会让中国做出积极的回应。在技术层面，如签证发放、信息交流、(下转第18页)

四、结论

综上所述,美国对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主权争议,以及日方在“撞船事件”前后的错误决策,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对华强硬程度与美国因素直接相关。美国错误地把钓鱼岛划入1972年归还冲绳的范围,但关于钓鱼岛主权归属,美方一直称“没有特定立场”,而是希望中日双方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谈判解决。即便在1979年中美建交之前,美方也从来没有对日方承诺《美日安全条约》适用于钓鱼岛。或许正因如此,日方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和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过程中,都与中方达成不涉及钓鱼岛问题、“搁置争议”的政治默契与共识。

然而,日本政府从1996年开始否认两国之间存在领土争议,不承认搁置争议的共识,也偏偏始于美国当年首次公开暗示“尖阁列岛”(中国的钓鱼岛列岛)适用于《美日安全条约》。于是,日本立即狐假虎威,变得有恃无恐起来。这说明,冷战后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立场的变化是日本变卦翻脸的重要外部因素。

目前,菅直人内阁和日本外务省在钓鱼岛问题上照搬1996年以来自民党执政期间日本政府的立场。在钓鱼岛海域下令拦截中方渔船,也是基于当时的错误立场和不断确认美方安全承诺的鲁莽行为,而日方最终放人也与美国政府不愿局势失控殃及自身有关。在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成功访美,中美关系修复后,料定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强硬做法会有所收敛。但是,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本未来还会在落实防卫计划大纲的过程中继续谋求美国

军事介入。

然而,1960年修订的《美日安全条约》第五条规定其适用对象是“日本国施政下的领土”。因此,即便从美国的立场上讲,既然美国从来就没有肯定日本拥有钓鱼岛主权,那么,没有主权何来领土?钓鱼岛根本谈不上是日本的领土,因为主权和领土是不能分割的,施政权决不等于主权。美国政府当年还刻意做了这种区分,强调交给日本的只是行政管辖权,而不是主权。如今的美国也不能无视这一事实,不能把主权和领土这两个概念分开。况且,中国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美国把中国领土钓鱼岛的施政权擅自交给日本。因此,即便从美国自身立场和《美日安全条约》第五条内容界定来看,美方关于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全条约的对日承诺也是毫无道理和法律依据的,是根本行不通的欺人之谈。

《美日安全条约》是美日两国的双边安排,不得对中国的领土主权和国家安全造成损害。为维护中美日三国关系大局,美国必须纠正其有关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全条约》的错误立场,而不能一错再错。美方曾建议举行中美日三边官方对话,但如果美国不改变错误立场,等于在赛场上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这只会造成美日联手进一步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恶果。不过,如果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能改变其军事介入的错误立场,鼓励中日双方和平谈判解决钓鱼岛争议,而不支持任何一方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也许可以在这一问题上发挥某种积极作用。这有利于中日双方根据《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处理钓鱼岛争议,有利于中美日三边关系的健康发展,有利于东亚地区实现低成本、高安全的可持续安全。

(上接第29页)实验室访问等,美国应先迈一步,让中国看到诚意,最大程度降低担忧。

(四) 渐进。沟通未必能解决所有疑问,甚至有可能什么也解决不了。美方希望了解中国战略部队的构成细节、作战思想、资源投入以及装备水平。中方同样想知道美国的这些情况,美方还需解释它为何寻求外空武器化和发展导弹防御体

系。这些关切使得对话异常复杂,决定了必须要有耐心与智慧。核领域一直是国家最为敏感的领域之一,交流对话会十分复杂和困难,两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把核领域里的问题全部解决,双方要有可靠路线图,从对话种类的定位、保持互信的心态、平等看待对方等方面入手,争取在可预见时间里达成阶段性成果。